新芽沙龙·第 5 期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青年交流的实践和展望

2019 年 6 月 2 日

中国和俄罗斯同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双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密切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民间交流却一直处于比较欠缺的状态。未来中俄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离不开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而青年人则是推动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强中俄青年之间的交流对于两国未来的发展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6 月 2 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青年交流的实践和展望”为主题的新芽沙龙。沙龙邀请到曾在中俄两国都有过丰富学习和生活经验的两国青年，分享他们的所见、所知、所感。

中国留俄学生总会前主席卢森通首先就“中俄两国青年交流合作的基础”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讲述了自己在学联的经历，认为通过学联这种留学生团体的形式来构建两国交流的平台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在这方面也有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据他介绍，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最好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与北京大学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俄高校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派出大量留学生前往莫斯科大学留学。1957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莫斯科大学时，对当时所有的留学生说出那句

著名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2017 年莫斯科大学中国学生学联曾给习近平主席写信，汇报留俄学生 60 年的变化，他们在 2017 年底有幸收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回信，主席在信中嘱托广大留学生要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早日学成堪当大任。

卢森通表示，海外的中国学联组织大多是隶属于当地大使馆教育处，同时与所在地的学校也有很好的联系。这决定了学联成员是以中国学生为主，但主要联络的对象是所在国当地的青年组织。中国学联与俄罗斯各高校的学生学联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因此称得上是中俄青年交流第一线的学生组织。俄罗斯的中国学联每年都会举办很多活动以促进中俄两国年轻人的交流，比如共同参观、志愿活动、开展跨文化交际沙龙、举办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等。每年学联都会邀请俄罗斯青年共同参与春节联欢，邀请他们来包饺子、学习书法，俄罗斯青年们都非常积极。此外，学联也经常去参加俄方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中俄青年友好对话、参观历史古迹等。卢森通认为，这些活动可以让中国青年了解所在国家的风俗和习惯，更好地与当地青年交朋友。

卢森通还介绍了中国留俄学生总会的情况。中国留俄学生总会是在中国驻俄大使馆教育处直接领导下，以在俄的中国学生、学者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性组织。1947 年中国留苏同学会成立（留俄学生总会前身）；1951 年改组为中国留苏学生总会；1991 年苏联解体后，中国留苏学生总会改名为中国留俄学生总会；2018 年，中国留俄学生总会进行机构改革，目前俄罗斯 3 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均是留俄学生总会会员。相

较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联，中国留俄学生总会接触的更多是俄罗斯社会层面的组织。比如总会曾组织成员参加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并献花，在世界杯期间也曾组织学生担任大赛志愿者。

卢森通指出，中俄两国在经济上呈现互补，未来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会进一步增多，也需要更多的能够深入了解对方国情的人才，这是中俄两国年轻人的机遇。通过两国青年的共同努力，中俄青年交流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光明。

俄罗斯留学生沙晓星和穆妍玉从中俄关系简史、留学交流和旅游业务三个方面分享了她们对俄中关系的认识。

沙晓星表示，1949 年 10 月 2 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 年 2 月 14 日，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双方又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协议。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两国领导人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的分歧日益增加，直到 1969 年才得以启动边境谈判机制，并持续到 70 年代末的。1983 年以来，两国在文化、体育、留学交流方面的合作快速发展。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于 1991 年 12 月承认俄罗斯联邦为前苏联国际权利和义务的继承国。1996 年以来，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务机制持续运行。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向和领域，都体现在 2001 年 7 月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目前，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已经建立，成为两国在安全发展战略领域协调合作的重要渠道。

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有色金属、木材和木材制品、矿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设备，中国在俄罗斯投资的重点行业是矿产开发、林业、能源、贸易和建筑。此外，两国还在其他领域推出大量合作项目，包括建立联合大学、中国国家卫生保健机构在俄罗斯普及中医治疗方法、加强旅游和体育交流、加强媒体合作等。

对于两国的留学交流情况，沙晓星认为，在当前国际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新形势下，在教育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受到俄中两国的重视，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俄中关系现在处于十分有利的历史阶段，高等教育领域的留学交换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的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方国家推行许多政策的目标和宗旨。各国坚信，教育国际化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实现教育国际化是全世界各个大学获得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此外，教育国际化影响到建立和维持国际上接受各种不同教育形式的可接触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好处包括教育资源的共享，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提升教育国际质量标准，加强学术和学生的流动性。最重要的是，世界各所大学的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开阔学生的眼界。可以说，教育国际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和政治稳定性，俄罗斯和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穆妍玉同学则对俄中旅游业的发展表达了观点。她认为，旅游是青年交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2018 中国促进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游客对赴俄罗斯旅游体验的满意度较高，

俄罗斯也成为2017年中国游客排名前15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据俄罗斯旅游署统计数据，2017年赴俄中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4.7%，达到 147 万人次，其中免签赴俄旅游的中国游客量增长了23%，达到94.4万人次。

赴俄中国游客人数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首先是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其次，中国人对俄罗斯深厚的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同时俄罗斯休闲旅游形式多样。俄罗斯正在推广友好中国城市项目，由此带动了宾馆、餐厅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中俄两国在旅游合作中持续推进创新，比如两国分别举办了中国旅游年和俄罗斯旅游年，这是中国首次与其他国家举办旅游年。两国企业间还签署了中俄旅游安全保险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成果都表明中国重视与俄罗斯的旅游合作，也一直在创新合作形式，这一状态未来还会继续。在政策的带动下，中俄旅游双向交流的规模持续增长，其中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的人数增速要更高一些。

2018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两国地方文化、旅游、教育、媒体等领域交流机制化、常态化，增进彼此好感和认同感”。在旅游交流方面，中俄两国领导人决定于2018年至2019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将地方合作确定为两年间双方合作的主线。地方合作一直是中俄旅游合作的重要基础，目前，双方已经搭建了旅游部长会议、旅游工作协调小组、人文委员会等多个成熟平台，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备忘录、会议纪要等成果体系。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对前两位同学的分

享进行了点评。

施越表示，此次新芽沙龙设定的议题是要描述中俄建交70年来两国文化和心态上发生的转变，例如在2000年以前两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跟对方有直接或是情感的认知，而此后随着两国中央和地方、官方和民间的交流机制不断增加，以及留学和旅游的机会的增多，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的途径也显著增多，因此发生了所谓“从对视到对话”的转变。

施越认为，从主题角度看，应当探求高校的学生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如何为官方和民间对话提供更多的建议。旅游过程中的短期的交流是很难深入的。在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的当下，人们很容易形成只停留在拍照留念层面上的“打卡式旅游”。特别是对于大部分中国游客来说，俄语是比较困难的语言，因此两国人民之间难以形成对话，而在留学过程中对话的实现则会相对容易。换言之，应当进一步思考目前一些政策或旅游项目该如何推动民间更加深入地相互了解。

关于中国民间舆论中对于俄罗斯的几种常见认知，施越表示，第一种认知是谈到俄罗斯时，大家想到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作家如托尔斯泰，以及俄罗斯艺术、音乐、歌剧、芭蕾等，而这些想象多少与圣彼得堡这个城市有关，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文化中的欧洲语言。第二种认知是更大范围内的中国民众对苏联时期的认知，如二战时期的坦克，以及一些俄罗斯的悠久传统，如进关之前一般要喝酒，斯大林时期的各种城市规划和建筑等。今天人们在莫斯科依然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斯大林时期的城市改造给当地

留下的深刻影响。第三种认知源自从事中俄商贸活动或在中俄交流中相对活跃的普通民众的观感。提及俄罗斯时会首先提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贫富极致分化的俄罗斯社会，很多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世界各地谋生，包括到中国的沿海城市。

上述三种印象一定程度上对应了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和新时期俄罗斯的文化表征。第一种认知往往是剥离了历史和对当下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文化认识，第三种认知就是一般人对俄罗斯一种朴素的认识。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印象大多是这三种刻板印象的组合，而这三种认知所包含的内容在当下的俄罗斯很容易找到。例如在圣彼得堡，古典文化与苏联时期的战争政治符号随处可见，再比如每年 5 月 9 日进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都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俄国人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依然对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有很高的预期，而且可以坚强地忍受社会经济层面的困扰。

北京大学俄语系的邹文卉以“从‘心’出发，‘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文化交流的微观现实与发展畅想”为主题，结合自己在俄罗斯的交换经历，分享了对中俄文化交流的看法。她首先对主题进行了简要阐释，指出“心”代表文化核心；“微观”则是因为自己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邹文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和相关国家在政策、基础设施、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和沟通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近年来频繁举办的各类高规格论坛活动中，对话、

对谈、合约签订及各领域的合作商讨以令人惊讶的密度和规模持续推进。毫无疑问，以各国青年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是实现“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之民心相通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不久前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她承担了部分大会志愿者工作。在会场中，她留心寻找与文化交流有关的活动和设施，发现无论是在此次的论坛中还是在不久前的中非合作论坛中都设置了相同的展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展示区。展区里设有国画、泥绘与彩塑、玉石饰品制作以及软陶饰品制作四个展位，每个展位为参与者准备了手工制作材料，并且有专人进行辅导，让参与者可以制作自己喜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饰品，并可将作品带走留作纪念。

邹文卉表示，作为一个大会期间的传统文化交流项目，无论是从设计感、参与感还是现场效果来看都非常不错，然而每当看到被人为设定的文化交流模型时，她也会反思，类似的思路是否也体现在当下主要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中，这种交流的模型是否也不断地在以各种外化的方式扩大和缩小，复刻着自己的逻辑。她把此类文化交流活动的特点总结为：第一，此类活动将传统文化及其表面形式（如国画、软陶、玉石、京剧或书法）拿来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悬置的事实，而这种与历史相割裂的事实不能直接与观众的任何现实经验产生共鸣。这些事实可以被触摸、被体验，但观察者看到的都是作为表象和既成事实的一种文化结晶。这种文化结晶作为历史的结果被直接提出，观察者无法直接追溯其形成的背景和历史原因，因此这种体验会给观察者带来挥之不去的

隔膜感和陌生感，或者说是一种与现实生活脱节而产生的不自然感。

因此，在传统文化这面旗帜之下，很多时候似乎是为了交流而去交流。然而，这种文化交流大多是由某个官方组织正式地举办和组织，因此无论是一个互动式的过程还是一对多的表演，往往带有大型表演的性质。它们规模大、频率高、持续时间较短，存在着所谓正式的“开始”和“结束”的标志。由此，这种活动相对而言也缺乏为观众提供进一步深入了解的可能性空间，活动进行过程中参加者会经历大批量集中的展示，相对应的是结束往往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交流内容的终止。即使有一小部分真正感兴趣的人，他们也很难找到带领他们进一步深入该文化核心所处的历史关系网，因此这类文化交流活动便更像一次表演和展示，而很难说是一次对话和交流。通过活动交换的是流动表面的文化形象和符号，却没有办法深入其核心。这种交流活动可以称之为“表象化交流”。她指出，并不是只有中国才面对文化交流形式上的困境。准确地说，这种困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希望将自己的文化推广至他国，增强他国对自身文化理解的国家。

对于如何使文化交流更加的深入有效，邹文卉提出了一个作为宏观政治文化交流的补充的“微观非正式交流”概念。在交换期间，她在就读于圣彼得堡东方法律系的语伴玛丽亚的帮助下争取到了一个给那些正在学习中国法律体系的学生进行演讲的机会。为了使演讲不只是一种文化展示或一种噱头，而是能够与俄罗斯学生们的学习相结合，从而向他们展示一个更深、更能够被体验和理解的中国，她结合自己的

社会学知识介绍了一些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概念，如中国的社会网络、关系网络，差序格局、人情社会、儒家的信善论，甚至是传统的宗法制度和丧服仪式。邹文卉表示，她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将观众置于一个整体的社会和历史网络之中，从而展现中国的法律概念和所有这些形成和发展的环境，以及它们为何会与西方法在根本上呈现出不同。这些法律学习者在学习中国法律形态的同时也可以开启对于其原始形态的思索，思考过去和现在有怎样的不同。她希望听众通过聆听演讲，深刻体会到在相似的社会核心运转下，这些表面上不同的体系依旧遵循着某种古老的理念或是运行逻辑。

邹文卉认为，一个好的文化交流项目应当具备以下特点：首先它应当把握住本国文化表征背后普遍的核心，而不是一场流于表象的展览；它应当呈现出一种根本性的框架，例如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脉络和环境，以及这个国家在生长过程中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这个国家拥有不同的精神气质、思想来源和社会结构，换言之文化交流的发起者应当有能力带领他们去穿越核心，深入到一个较为立体的空间，而不是只提供一些扁平印象。

第二点是要找准受众的需求，拓展已知，避免生涩概念的灌输和无效的表象狂欢。这指的是要将悬置的、被拿出来作为象征的文化嵌入到每个人的具体生命里，与他们实际生活中的思考相结合。

最后一点是需要穿透文化现象寻找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内核。这点相对而言是最为困难的，因此只能说是一

种追求和探寻。虽然困难，但并非全无可能。邹文卉提到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看来，陀氏是一个以问题化的小说叙事为主要表达方式，以思想为表达途径的俄罗斯作家，他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俄罗斯的，是民族的，并且他言说和进入问题的方式是很独特的，他往往通过小说去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而不是去撰写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他站在民族的角度，面对的是人类和时代共同的问题：在一个现代性来临的世界，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开始烟消云散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中重新进行自我安置，又如何重新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

邹文卉认为，文化交流也可以有具体的、微观经验的一面。它不再是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对视，而是沿着通向普遍概念和文化核心的道路所发生的对话。这条道路首先是坚实的，依托于具体实际的生活经验；同时要以个体不同的需求作为推动力，号召个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着另外一种文化进发。因此，这种文化交流不要求一种固定的范式，而是鼓励多元积极的实践和尝试，引发思想涟漪的相互勾连和不断拓展，最终实现有效且深入的、不断涌动着生命力、但又不拘一格的交流体系。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费海汀对邹文卉提出的交流的三个层次和三个目标进行了点评。费海汀指出，跨文化交流的动机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自己的专业（比如外语）决定必须要进行交流，第二种是出于对他国文化的好奇心。在此基础上，跨文化交流也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让原先不知道的人知道；第二个层次是让有偏见的人消除偏

见；第三个层次是让知道的人加深了解。

对于国内的俄罗斯研究，费海汀认为，需要加强理论建设，因为仅凭掌握材料就能做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如果光是靠材料，那么可能很容易被业余爱好者超过，因为现在的许多资料都可以在互联网上非常方便地获取到。超越这个层次之后，我们应该如何交流？此前的学术研究大量集中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慢慢变成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但实际上我们对俄罗斯的国内政治缺乏了解，对俄罗斯的很多了解也经常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费海汀指出，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交流，在交流时不能停留在话语本身，而是应挖掘话语和概念背后更深层的知识。对于中俄交流而言，我们首先得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说话——我们有很多套语言体系，有政治语言、宣传语言、生活语言、学术语言，要用别人“听的懂的语言说话”。费海汀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曾经很了解俄罗斯，但现在并不了解它们；俄罗斯同样如此，曾经很了解中国，但现在也不了解中国。两国的关系非常紧密，在新时期双方应进一步加深关系。

在互动环节，有听众向邹文卉提问，她眼中俄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邹文卉表示，虽然她现在很难说已经对俄国文化的核心有所了解，但一些具体层面的经验比如俄国人话语中所表达的历史和记忆对她来说可以算是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在俄罗斯交换的时候，彼得堡大学的老师曾经讲过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妇女为指引士兵避开冰上的窟窿，站在刺骨的冰水中，因此丧失了生育能力。邹文卉认为，这样

的表述相比起书本上的数据，能让她更加深刻地了解战争的情况。此外，她还指出，在谈及俄罗斯文化核心的时经常会讲到矛盾和两重性，但这些都只是一些标签，更重要的是怎样用自己的经验填满标签。她倾向于拿自己的内容去对应每个特质，而不是将标签贴在自己所听到的东西上面。

曾在俄罗斯留学 5 年的李闻笛讲述的话题是中俄青年眼中对对方的印象偏差。他表示，学俄语、研究俄罗斯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局内的局外人，长期以来对于一些事的看法易固化，对某个人、某个群体、国家、民族会形成非客观的群像。例如大家提到普京，就会有他是“猛汉”的印象，对于俄罗斯的看法大多描述为寡头、伏特加、不正常的一些官僚、啼笑皆非的办事逻辑等等。又如，中国人认为俄罗斯人都喝酒、好战斗，其实不全是这样。他表示，国民形象之间的偏差也可能是相互的，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很少的，甚至认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在内的整个东方民族都是一样的。此外，如何融入对方的文化也是个大问题。比如在国外学习是否需要给自己起个外国名字，很多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都会有英文名字，但印度人却很少有。现在都在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不从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开始讲起呢？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庄宇对李闻笛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她表示，俄国文化具有多样性的，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地深入了解后，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要不断地接触和融入，这样才会对俄罗斯有比较准确的认识。真正懂得、了解俄罗斯的人是在对其文化不断地理解，对其哲学文学不

断地阅读这样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

关于对俄罗斯认识的多样性理解，庄宇认为，这是由历史特点造成的，比如在教授俄国史课程时，首先要和学生分享俄国史、苏联史、俄罗斯史几个概念，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历史存在一个被人为切断的过程，导致它产生了不同的侧面，让很多“圈外人”觉得难以理解。提到俄国史时一般都会强调如何理解俄罗斯文明的一些特征，俄罗斯人自己总结的包括有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主性。专制制度是所有的权力集于沙皇一人之手，民主性是说所有的臣民要忠于他自己的沙皇的认识。按照她的理解，东正教才是俄罗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俄罗斯人很极端，他们认为只有天堂和地狱，非黑即白。虽然经过苏联时期的去宗教化，但在当今的俄罗斯，仍有非常多的人认为宗教是极其虔诚的信仰。他们认为宗教不是浮于表面的形式上的宗教，而是一种与上帝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是祈求神灵、自我神秘修行的过程。

庄宇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了中俄青年交流的思路。他认为，虽然当今社会信息媒体比过去发达很多，但国内一些人对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认识仍局限于历史的一个侧面，由此会产生偏见。因此，要读一些有深度内容的书，去这个国家真正感受一下俄罗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就像列宁说过的那样，“学习学习再学习”。

庄宇表示，彼得堡和莫斯科是差异非常大的两个城市，彼得堡是俄罗斯帝国时期所有成就的象征，尤其是 19 世纪光辉的集中体现；莫斯科更像是从蒙古鞑靼时期就已经形成

的、被大家现在称为“东方文化”的代表。红色共产主义政权在历届领导人手里，特别是在斯大林的创建下，使其变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都城。可以说，莫斯科是东西包容性较强的地区，而彼得堡则是一个西方文化比较突出的地区。

最后，三位教授分别对本次沙龙进行了总结。

庄宇强调，我们不应认为语言是跨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中的核心，语言只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我们把语言掌握好，只能达到一个可以对话的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避免“用同一门语言各说各话”，而是要用同一门语言进行深度交流，坚持“现实主义”，而不是“形式主义”。

费海汀认为，不应为了交流而交流，目前官方组织的很多活动给大家提供了交流平台，但有时候在实际交流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不过，对此我们不应过分苛求，而是应该看到这只是第一步，未来我们会有更多提升交流水平的可能性。此外，中国与欧美国家交流的形式也可以应用到中俄交流领域，比如在每年举办的北京论坛中邀请更多的俄罗斯学者，改变目前较少俄罗斯专家参会的现状。如果我们多做些这样的活动，未来两国就会有更多深入交流的机会。不过，相互了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大家的长期努力。

施越认为，在跨文化交流中应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先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与他人交流前首先应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我们要思考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什么是“中国的”，与他人交流时用什么东西来展示我们的独特性。这个其实与认识“什么是俄罗斯”异曲同工。明白这个道理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交流对象对交流的议题产生兴

趣。在对以上两点有充分认识后，我们在如何与俄罗斯进行交流，或者说如何认识俄罗斯文化这个问题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必要的焦虑。

新芽沙龙•第 8 期

英国脱欧与欧洲安全

2019 年 9 月 19 日

9 月 19 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第 8 期新芽沙龙，邀请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唐纳（Ben Tonra），围绕“英国脱欧与欧洲安全”主题与青年学生进行交流对话。在主题发言中，唐纳教授讲解了英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为何英国脱欧在安全方面对爱尔兰至关重要两个重要问题，也谈论了欧洲安全前景、英国脱欧对后者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有何影响等更广泛的议题。

一、英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

唐纳教授认为，英国一直是欧洲的主要大国，今天它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心，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多年来，英国对欧洲安全防御做出了重大投资和承诺，也是欧盟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要建筑师，在政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 50 年间，欧盟一直在制定自己的安全与防御政策。英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特征在于，它一直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参与者，在法国意见与其他国家意见之间提供了一定的平衡，并且一直是欧盟政府间决策的坚定捍卫者。

唐纳教授表示，欧洲的防卫与安全政策的确在关于英国脱欧的争论中发挥了影响，因为许多英国人担心欧盟会拥有自己的军队。在英国内部发生的另一场辩论关于英国在世界

上的地位，这一辩论由来已久——它应该更靠近美国还是更靠近欧洲大陆？它在英联邦国家中是否更有地位？此外，英国还担心欧盟的安全防御政策的发展会削弱北约，而后者一直处于英国的国防核心。因此，出于以上原因，几十年来，英国与欧洲大陆在安全和国防领域的合作一直举步维艰。

唐纳教授指出，英国脱欧没有赢家。欧盟失去了英国在地缘政治力量、军队、外交网络、情报机构及决策等方面的贡献；英国也失去了其他 27 个合作伙伴的权重，而历史已多次证明，这种力量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其他任何组织中都对英国非常重要——英国像法国、德国一样站在其他 27 个欧洲国家的肩膀上，这一地位为其发声赋予了更大的能量。英国国防部、外交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英国正在失去力量，但他们也必须尊重已经进行的投票以及英国人民离开欧盟的愿望。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二、英国脱欧对爱尔兰安全的影响

在谈及英国脱欧对爱尔兰安全的影响时，唐纳教授表示，英国脱欧刚发生时，爱尔兰深怕被夹在英国和欧盟这两大全球势力之间。但爱尔兰政府、所有政党和其社会成员都认为，爱尔兰不会被摧毁，反而会得到加强，深化其作为欧盟成员的承诺。不过，北爱尔兰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爱尔兰岛的一部分属于英国，如何管理这一地区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唐纳教授指出，这不是“一国两制”，两国在管理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已在《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Belfast Agreement）中达成一致。该协定认为，

北爱尔兰居民可以拥有英国护照或爱尔兰护照，或同时拥有两本护照。国籍在工作、住房、公共服务、健康福利、经济和贸易等方面都不受限制。该协定结束了曾在爱尔兰岛持续了 30 年的暴力——1969 年至 1994 年间的教派冲突导致了约 3500 人死亡。冲突的一方是民族主义者、共和党和天主教徒，另一方则是联合派和效忠派；一个群体被标定为爱尔兰人，另一个则被标定为英国人。该协议的重点是国籍不重要，该地区的居民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都一样，这一点对爱尔兰岛的和平贡献巨大。英国脱欧的最大问题是它有可能破坏这一协议，因为脱欧后许多地区居民的国籍将变得至关重要。

唐纳教授认为，未来岛上可能会有一个实体边界，有栅栏、海关哨所和出入境检查站，而这些恰恰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对于爱尔兰人来说，保持边境开放非常重要。当英国表示他们将实行开放贸易时，爱尔兰人会说："这当然好，但我们如何能在不设置海关或没有摄像头等技术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总会有人跨越边界，而越过边界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因此，爱尔兰的恐惧是目前和平的边界将面临暴力的威胁。

伦敦和都柏林之间围绕如何解决问题、英国如何能在脱欧时保持开放边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敏感和危险的谈判，尤其是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为双方提供了稳固的和平基础的前提下。这一问题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很大压力，这就是爱尔兰主要的安全问题。

爱尔兰外交官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前就已致力于告知其欧洲伙伴和欧盟盟国这一公投对爱尔兰有多重要。对于爱

尔兰而言，这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安全危机。认识到这一事实后，欧盟将爱尔兰边界视为同意与英国就任何未来关系进行谈判前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之一。因此，爱尔兰目前的处境就像在经历一场离婚谈判，在双方都同意离婚之前不会讨论任何未来生活。

三、英国脱欧造成的其他问题

首先是欧盟的安全与国防合作及其一体化。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英国与欧盟面临着许多相同的威胁，并且对于威胁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比如，他们都致力于多边协作和建立安全合作机构，这为双方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威胁提供了动力。但英国脱欧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目前伦敦和布鲁塞尔之间的气氛不太友好，同时，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正在撤出欧洲，这使得许多欧洲国家不得不在安全防御方面多为自己打算。莫斯科的所作所为也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欧洲人在考虑欧盟走向何方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成员即将退出的事实。

唐纳教授的一位中国同事曾有疑问，“随着英国离开欧盟，欧盟将变得越来越虚弱和碎片化，它能撑多久？”唐纳教授的回复是，“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英国的离开，以及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密。”实际上，从欧盟共同防御与安全政策近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其一体化的程度在加深，在共同的安全防御政策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过去 20 年的发展速度相比，这几乎是欧盟在安全与国防合作领域的一场革命。

正如一位欧盟官员所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欧洲，

这是我们的公民想要的，也是整个世界所期望的。目前欧盟内外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我们的联盟受到了威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和民主的‘欧洲计划’正在被质疑。”纵观匈牙利和波兰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政治力量都在攻击民主的基础，即“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对于建立在这两项原则之上的欧盟而言，这正是危机所在。这一危机也威胁到了欧盟的原则，即只有完全民主的国家才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因此，匈牙利和波兰已经启动了相关法律程序，以使成员国遵守欧盟的原则。

唐纳教授指出，目前所有欧盟国家的国防部都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防御政策，他们必须向布鲁塞尔提交计划，所有国防部长都必须坐下来讨论其他所有国家的国防计划。他们会说，“你们的预算还不够多。”“你们的预算都花在了错误的地方。”“你们为什么没有航母？”或是“你们为什么要将部队放在那里？”这些讨论有助于在安全和国防领域发展出更加一体化的合作方案。

欧盟在共同的安全防御政策方面的议程正在加速，并且正致力于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军事部门。目前，欧盟在海外约有 34 个文职和军事特派团，这些行动的费用由参与国政府支付。例如，如果爱尔兰派遣了 450 名士兵和 300 名法国士兵一起到乍得实施行动，那么爱尔兰政府必须先垫付这 450 名爱尔兰士兵的所有费用，之后这笔费用将从欧盟的预算中支出。

欧盟内部现在还在建立新的机构，以赋予这些部门更大效力。例如，英国政府一直在反对建立欧洲军事总部的想法，

该机构是国防力量中负责作战的单位，专家们在那里工作、制定战略，当有行动实施时会有专门人士负责操作。英国认为欧盟不需要这样一个部门，因为这是北约的任务，而英国不希望欧盟重复或破坏北约的责任。现在，一直反对的英国要离开了，欧洲人终于可以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军事总部了。从这个角度看，英国脱欧实际上移除了欧盟国防领域一体化深入过程中的一张反对票。

最后一项是 PESCO，即法国倡导的永久结构化合作组织。这是欧洲军队之间一系列发展、改善和加强其军事能力的项目。例如，某个国家可能有一个有关网络战的项目，一个涉及海上监视的项目或一个关于军事训练的项目，它可以将一部分欧盟成员国聚集在一起发展这一项目，进而分享该项目的成果。PESCO 的重点是加深和强化欧洲在军队与国防部门之间的一体化，而不是建立一支欧洲军队。不过，唐纳教授认为“欧洲军队”不会出现，因为这样一支军队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欧洲主权，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欧洲主权，只是 27 个欧洲主权国家在欧盟的框架内共享、合作甚至实现一体化。

欧洲军队的概念尚不在议事日程上，而且“欧洲军队”一词的使用可能会造成政治上的混淆。唐纳教授表示，他曾询问过一名法国高级外交官，为什么马克龙总统总要说“欧洲军队”，而总统本人知道这个词不是他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意思，他想说的是“更加一体化的欧洲军队”，他为什么这样做？法国外交官的答复是，“这一想法在法国选民中很受欢迎。当选民在演讲中听到‘欧洲军队’这个词时会说‘是

的，我喜欢这个想法’！但这不是马克龙、默克尔或容克真正的意思，他们追寻的只是欧洲军队与国防的进一步一体化。”

唐纳教授认为，今后欧洲的安全与防御体系将拥有充足的资金，欧盟委员会及其成员国已经承诺在国防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方面投入 400 亿欧元。在未来七八年内，这笔钱将被用在国防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共同防御系统的设计和采购等。过去北约一直为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承担共同防御的责任，空中加油就是一个例证。在北约的框架内，空中加油技术一直是由美国提供，但如果特朗普撤出欧洲，欧洲国家就必须掌握这一技术。但是爱尔兰空军不会买一架运油机来加油，比利时空军买不起这种运油机，英国空军可能有一架，法国空军可能有两架，而德国空军永远不会为此花钱。也许这些国家可以共同购买一架运油机来为欧洲所有的战机加油，每个国家只需支付很小一笔钱。这就是 400 亿预算可能达成的效益。

其次，欧盟目前正在遭受来自内部的困难。欧洲一体化的传统动力源于德法两国之间的关系，但目前巴黎与柏林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两个国家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欧洲人所期待的那种一体化。如果英国退出，法国和德国很有可能取代它之前的地位，但是这两个国家必须达成共识，才能将一项计划提交给其他 25 个国家。欧盟内部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战略构想。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恐惧和担忧，在欧盟内部曾进行过几次关于应该如何安排欧盟预算的激烈辩论，在解决中东危机、地中海危机或北极危机等

问题上，欧盟的 28 个成员国都有不同的观点。

第三是欧盟-英国关系的未来发展问题。英国和欧盟长期在北约框架内合作，也将继续留在北约。英国和欧盟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和恐惧，也希望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应对这些威胁，因此，他们继续合作是非常合理的，但政治并不总是明智的，政治中也有情感，而英国脱欧的政治情绪是不太好的，这必然意味着在安全防御领域合作的政治情绪也将是糟糕的。他们必须思考如何保持安全防御合作，但同时也要面对使其合作关系有可能分崩离析的各种因素。

从欧盟的角度看，有两种基本选择。第一，英国受到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待遇，被视作加拿大、美国或土耳其。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例如，欧洲人设计出了用于全球定位的“伽利略”卫星系统，这使欧洲人不必再依赖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英国虽然正在离开欧盟，但它可以说，“我们为伽利略卫星系统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这个系统。”但欧盟却说，“对不起，你不是欧洲国家，如果我们让你使用这一系统，我们就必须让美国使用。如果我们让美国使用，那么‘我们’的系统就不存在了。”这将有可能引发一场斗争。

将英国视为第三方国家既不利于英国，也不利于欧盟，因为英国是国防大国，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因此，欧盟希望与英国建立一种特殊关系，但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由于欧盟基于法治原则，其条约是非常具体的，成员国拥有一定权利，非成员国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因此，如果英国不是欧盟成员国，它怎么能参与到欧盟的安全防御系统中呢？如

果欧盟给予英国特殊地位，那为何不给挪威、土耳其和其他非欧盟成员国以同样的特殊地位呢？因此，从欧盟的角度看，特殊关系或非特殊关系两个选项都会引发不同的问题。

英国面临的选择更加困难，因为它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些英国人甚至想重现大英帝国在国际海域上的往日辉煌，建立新的英联邦国家，印度会回来，加拿大会回来，他们会重建这一囊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日不落帝国。这是一种疯狂的想法。英国国内还有一些政治组织将其关于未来的愿景重点放在大西洋，这种想法和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有关。英国的第三种选择可能是与欧盟建立某种特殊关系，即半脱离、半接触的关系，但问题是目前这两件事不相交、不重叠。

总而言之，英国对欧洲安全很重要，这种地位不会很快改变。欧盟和英国面临着一些相同的威胁和风险，也共享一些应对威胁和风险的方法。如果欧盟和英国携手合作，它们都将变得更强大，但问题是目前人们并不知道英国想要什么以及欧盟可以提供什么。

当天，来自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学生围绕沙龙主题与唐纳教授进行了交流。

问：如教授所说，欧盟的国防安全正向更加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但我认为不应该消除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欧盟正面临着一场重大危机，唯一积极的是，欧盟拥有解决这一危机的工具。欧盟条约提供了一些解决成员国民主危机的具体条款。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该国的

右翼势力从欧盟理事会中移除。但是，这个问题指出了目前右翼势力和反欧盟情绪的上升。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马林•勒庞在总统选举前一直在说法国离开欧洲，意大利民粹主义者一直在说意大利离开欧洲，一些人甚至在说意大利退出欧盟，芬兰的真芬兰人党（True Finns）也在说芬兰退出欧盟，但在目睹了英国脱欧和其对英国的影响后，他们对欧盟的批判仍然存在，但不再说要离开了。英国发生的事已经成了一个例证，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想面对那种局面。但就反欧盟情绪而言，一些英国人认为英国脱欧是欧盟瓦解过程的开始。英国率先退出，然后是希腊，然后是法国，然后是意大利……但我想再次重申，完全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

问：正如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但实际上我们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您认为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会不会有一个严格的边界？爱尔兰会不会跟随英国？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会对其他成员国发出警告吗？

答：我想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跟随英国八百年了，但对我们来说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我们独立了，但在爱尔兰仍然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也许我们应该脱离欧盟加入英国。但是，每个人都在注视着英国发生的一切，没有人愿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从欧洲伙伴那里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团结的显著而积极的表述，因为我们的欧盟伙伴将爱尔兰的边界问题置于其关于英国脱欧谈判要求的首要地位。英文中有一个

谚语“把某人扔到公共汽车下”，意思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每个人都说当谈判变得非常困难时，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会对爱尔兰说：“算了，英国更重要，我们要和英国打交道。”这从未发生过，也不会发生。这种团结非常有力且十分重要。这并不是因为法国、德国、意大利或波兰是好国家，这不只是慷慨，也不只是道德，而是非常核心的自我利益，即欧洲伙伴们是否表现出了团结。在 27 个欧盟合作伙伴中，大多数国家和我们一样小。如果欧盟为了与英国达成双边协议而牺牲爱尔兰的利益，其他小国会自问“我会是下一个吗？”这将从内部摧毁欧盟。

问：我阅读了您关于英国脱欧和爱尔兰安全防御的论文，对爱尔兰的案例很感兴趣。您认为爱尔兰人民在当前框架下在安全和国防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特别是考虑到人员和基础设施的短缺，在援助民间的力量上遇到了问题。我想问爱尔兰政府将做些什么？爱尔兰人民可否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处获得支持？

答：因为爱尔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自然资源很少，所以我们必须合作，而全球化是合作成功的关键。同样，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中一个重要的成功参与者。小国也希望对这一过程有所控制，中国足够强大到掌握这种控制权。但是小国必须合作。因此，我们加入了欧盟，在这里可以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全球化，并使它为我们服务。

问：我对英国脱欧对欧盟安全防御合作的影响很感兴趣。我们知道，英国脱欧势必会对欧盟的安全和防御政策产生影响，例如资金和供应链。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英国更

有可能与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安全伙伴关系，还是与更多国家建立双边安全伙伴关系？哪种关系对爱尔兰而言更好？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财富》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条评论称，“英国脱欧正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比，它释放了英国的魔鬼，并给了爱尔兰一个光环。”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答：英国国防部曾表示，如果无法建立欧盟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建立普遍的英国-欧盟友谊，他们就会开展与各个欧洲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以发展和维持这种安全和防御。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英国脱欧释放了魔鬼吗？”我必须谨慎，因为我是爱尔兰人，我想尽量保持公平。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新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即英国人处在一个庞大帝国的核心地带，这一帝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也包括我的国家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对英国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大英帝国或英联邦，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但这种情绪依然遍布英国。英国人觉得自己很特别，参与欧洲事务限制了他们，削弱了他们，把他们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但我认为他们确实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比德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更重要。

讽刺的是，这种英格兰民族主义现在正在威胁着英国，因为不仅在爱尔兰岛上人们开始讨论北爱尔兰离开英国加入我们，苏格兰也有很多声音，近一半的人在谈论苏格兰独立。真正奇怪的是，他们问投票赞成英国脱欧的人，“如果英国脱欧如此重要，您是否很高兴看到北爱尔兰、苏格兰甚至威尔士离开英国？”大多数人都同意，他们将很高兴看到

自己的联合王国解体，这些人才是英国释放出来的恶魔。